

指令与自主

共产国际·苏联·中国革命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指令与自主

共产国际·苏联·中国革命

孙武霞 翟作君 朱敏彦 等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指令与自主

共产国际·苏联·中国革命

孙武霞 翟作君 朱敏彦 等编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江苏武进第三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4万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7—80515—539—9/K64

定价：3.96元

前 言

迄今为止，共产国际无疑是所有无产阶级国际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它不仅根据布尔什维克党原则创建了自身，而且把布尔什维克建党模式推广全世界，建立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它存在的历史时期内，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几乎都是它的支部，毫不夸张地说，它充当了社会主义革命发源地和指挥中心。

列宁在共产国际建立中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会过份的，没有列宁，就不可能有第二国际的分裂和共产国际的诞生，他给共产国际规定了性质、目标、原则和任务，他亲手缔造了一个新国际。列宁建立共产国际的理论依据，在于对世界前景的认识，他在分析了帝国主义特征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后，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近在眼前，基于这一论断，他急于敦促新国际的建立，敦促各国共产党的建立，以便使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在新国际的统率下，迎接和推动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实

现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国际化。列宁的这一构想，是在十月革命和欧洲革命高潮的气氛下形成的。然而，就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欧洲各国的革命浪潮已趋平息，世界革命高潮并没有到来。

就在人们殷切期待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东方出现了革命奇迹，中国、印度、朝鲜、土耳其等落后国家，人民革命蓬勃发展，革命风暴此起彼伏。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不仅横扫封建统治，而且矛头直指外来侵略者。东方国家气势磅礴的革命运动，惊动了西方各无产阶级，包括列宁在内的共产国际领袖们为之一振，于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口号应运而生了，民族解放运动被提高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的位置，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共产国际与中国建立了热极一时的联系。而把民族解放运动摆在全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上，恰恰是共产国际的一大特点。

共产国际存在的年代，始终和中国革命保持着密切联系，从1922年至1942年的21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它的下属支部。中共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在这四个历史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维护着团结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起了任何国际组织无可比拟的历史作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如果辟开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就相互关系的实质而言，两者的关系始终处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苏联利益与中国利益、十月革命经验与中国国情、集中领导与独立自主的对峙之中，大凡上述诸方面处理得当的，就使中国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反之则给中国革命带来消极影响，使中国革命受挫。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错误的教训，都对当时和当今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着重大影响，都是国际共运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有重要意义。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重要课题,上海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结合教学和科研工作,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有的开设了专题课程,有的以此专题为研究方向培养硕士生,有的出版了专著,有的编辑了资料,此外还发表了许多论文。但是,由于主观水平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深感不足,无论是课题研究深度广度,还是资料的发掘积累,或者国内外包括本地区的学术发展等方面都跟不上形势需求,在研究力量的培养和集中方面也缺乏组织保证。为了推动上海地区对于该课题的研究,1988年1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建立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组,并由该研究组召集人孙武霞副教授组织上海地区的有关同志,从已经考虑到的各个角度立题编撰了这个集子,它是我们集体的成果,是共同努力的产物。

在书名和布局上,大家煞费苦心地尽力跳出现今已有出版物格调,使读者有一个面目一新的感觉。纵观全书内容,有若干选题立题新颖,甚至是第一次立题阐发,若干选题有一定深度,有些材料是第一次和读者见面。正因为具有选题广泛细腻,布局新颖的特色,很可能在带给读者新鲜感的同时,也有许多不妥之处;还因为本书采用专题阐述,内容上也难免有些交叉,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委成员有(按姓氏笔划为序):朱敏彦、孙武霞、陈卫东、陈世雷、周鸿根、翟作君。全书由孙武霞、翟作君、朱敏彦统改定稿。

编著者

1989年10月于上海

目 录

[1] 前 言

[1] 一 世界共产党和国际苏维埃

[1] 为了世界革命

共产国际的建立(1) 苏俄政府三次
对华宣言(4) 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9)
出席共产国际重要会议的中共代表(11)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5)

[21] 铁的纪律

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21)
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25) 《加入共产国际
的条件》(29) 《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
讯》(32)

[34] 二 亚洲的觉醒

[34] “助产士”、落后国家建党

魏金斯基与中国共产主义小组(34)
共产国际二大民族殖民地理论纲领(37)
马林来华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40) 建党
初期马林与陈独秀的冲突(43) 共产国际三

大和“到群众中去”的口号(47) 远东会议
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49)

[52] 四个阶级大联合

共产国际四大关于《东方问题的提纲》(52)
马林与国共合作方针的确定(55) 赵飞与
《孙文赵飞联合宣言》(58) 共产国际关于
国共合作的两个指示(61) “孙逸仙博士代
表团”赴苏考察(65) 鲍罗廷与国民党改组
(68) 共产国际的十一月决议(72) 鲍
罗廷与国民党一大(74)

[78] 三 中国的一九〇五年

[78] 因为她打击了列强

苏联顾问与黄埔军校的创建(78) 苏联
顾问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80) 莫斯科
东方大学(83) 莫斯科中山大学(86)
魏金斯基与中共四大(89) 共产国际和苏
联声援中国大革命(91) 共产国际与冯玉
祥的国民军(95) 加伦与北伐战争的胜利
进军(97)

[100] 保姆与苦力

国民党二大与共产国际代表在政治上的退让
(100) 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全会关于中国问
题的决议(102) 布勃诺夫使团中国之行
(104) 三二〇事件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妥协退
让(107) 整理党务案与共产国际代表在组织

上的退让(109)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11)

[114] 被歪曲了的列宁原则

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114) 四
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117) 共产
国际与东征讨蒋战略(121) 中共五大的召开
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内部争论(124) 共产国际
执委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26)
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内部对中国革命问题的
争论(130) 共产国际的反托洛茨基斗争
(133) 鲍罗廷与危机中的武汉政府(136)
罗易解脱武汉政府危机的措施(138) 大革命
失败与共产国际的历史责任(141)

[145] 四 苏维埃与新理论

[145] 苏维埃万岁! 红军万岁!

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145) 罗明纳兹与
八七会议(148) 罗明纳兹的“不断革命论”与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152) 纽曼与广州起义
(155) 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
题的决议(159) 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六
大(162)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66)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169)

[173] 从布尔什维克化到教条化

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173)
联共(布)党内反布哈林的右倾对中国党反倾向的

影响(176) 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及其对中国的影响(180) 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183) 共产国际七月指示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85) 中东路事件两个口号的争论(189) 米夫支持下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2) 共产国际的决议与王明的《两条路线》(196) 共产国际与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9) 共产国际与福建事变(202) 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206) 遵义会议——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转折(208)

〔212〕 从工农革命到人民革命

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212) 《八一宣言》的制定(215)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219)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223) 苏联、共产国际与盛世才(226)

〔231〕 五 务必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

〔231〕 为了树立蒋介石战胜日本的信心

苏联政府与南京政府的几次谈判(231)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234) 苏联的易货援华贷款(238) 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241)

〔244〕 在苏联利益等于各国人民利益的口号下

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右倾错误(244) 《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抗战的影响(247) 毛泽

东与共产国际围绕“保卫苏联”问题的争论(251)
弗拉基米洛夫与《延安日记》(255) 共产国际
与延安整风运动(258) 共产国际解散的原因
和意义(261) 《雅尔塔协定》的形成(264)
苏联出兵东北与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268)

[272] 附 录

一 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中共重要会议简表
(272) 二 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重要会议
简表(275) 三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
简表(278) 四 《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
讯》发表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稿简表(279)

一 世界共产党和国际苏维埃

为了世界革命

共产国际的建立

1919年3月2日至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宣告共产国际诞生。

共产国际的建立，并非有人认为是杰出人物的“即兴之作”，或是少数人“主观意志支配”的结果，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产物。

第一，从国际政治形势看，建立共产国际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世界政治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国际各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袖，公然站到本国资产阶级一边，高喊“保卫祖国”，鼓吹“国内和平”，支持本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巴塞尔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和宣言，宣示了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彻底破产；战争使俄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欧洲无产阶级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

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帝反战的革命浪潮。帝国主义者则在“国际联盟”的伪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革命，革命运动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形势的变化，向国际无产阶级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国际舞台上重新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确保国际共运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必须在革命形势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加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为迎接革命新形势的到来和帝国主义者的进攻作组织上的准备；必须有新的国际性无产阶级组织代替行将灭亡的第二国际，同“国际联盟”相抗衡，从而提高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威力，保卫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地。上述历史任务，只能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来完成。

第二，一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基础，为共产国际的建立提供了客观条件。随着世界大战爆发和第二国际破产，列宁及时地洞察建立新国际组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了建立新国际的设想。他认为，机会主义的国际虽然破产了，但是，无产阶级的国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工人群众定将冲破一切障碍，建立新的目标。这既是预言，也是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的斗争任务。1916年4月，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向布尔什维克发出了着手“发起建立革命的国际，建立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反对‘中派’的国际的”号召，并为建立新国际作了一系列的准备。由于在列宁发起和推动下，1915年3月26日至28日，在伯尔尼召开了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通过了谴责战争反对和平主义的决议。4月4日，在伯尔尼举行国际无产阶级青年代表会议，表达了革命青年的反战意愿。同年9月和1916年4月，又先后召开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昆塔尔会议等。这些会议，为团结左派、建立新国际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左派领袖的共同努力，一批共产党和左翼组织相继建立。这些共产主义组织的诞生，为共产国际建立打下了初步组织基础。到1919年3月，共产国际宣告成立时，被列入共产国际成立大会邀请书内的

无产阶级政党和团体就达39个之多。除俄共(布)之外，还有斯巴达克联盟、德意志奥地利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共产党、芬兰共产党、荷兰共产党等等。

第三，列宁大量理论工作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为共产国际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列宁发展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为共产国际提供了指导思想 and 理论基础。列宁曾说，“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了第三国际的思想基础和策略基础，这个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共产主义的国际，它既估计到和平时代的成就，也估计到已经开始了的革命时代的经验。”布尔什维克党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过程中，创造了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民族解放、工农联盟等经验，使各国共产党学有榜样，对新国际的建立起到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说共产国际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从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基本条件而言的，当然不是说共产国际成立的条件完全成熟了。共产国际也如同许多革命组织一样，在它刚刚诞生和筹建时，还表现得不那么成熟。

从组织发展状况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共产党的建立表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出席共产国际成立大会时有21个国家的35个组织，但是，其中共产党只占少数，除俄共、德共、奥共、匈共、波共外，其他多数刚从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中分化出来，人数少，影响不大。从思想政治状况看，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无产阶级觉悟迅速提高；另一方面，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势力还相当强大。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只是刚刚开始传播，工人阶级刚刚开始从自发状态向自觉阶段转变。各初建的共产党正处于幼年时期，理论水平不高，尚未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尽管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已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完整理论和成功的经验，但要把它运用到各国革命实践中去，需

要各国党自身努力。在这样基础上建立共产国际，条件是不够充分的。正因为这样，给共产国际在以后的发展中，带来了诸如过分依附于苏维埃国家，不能发挥和集中各国党集体的智慧和经验，甚至束缚各国党独立自主的发展等不良影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损害等。然而这些并不影响共产国际的建立。共产国际建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1. 在理论上总结了正在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初阶段经验，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为纲领原则，为所有国家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团结奠定了基础。2. 在组织上号召各国共产主义者全力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叛变政策，在组织上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中派实行彻底决裂，从而宣告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统治地位的破产。3. 在东西方筑起了桥梁，把欧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了，使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孙武震)

苏俄政府三次对华宣言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后，取消了沙皇签订的损害各国权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制定公布了《和平法令》。宣告“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提议，立刻开始进行建交民主的和平谈判。”“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占领别国领土的行为。”《法令》提出的弱小民族和“交战国”，包括中华民族和中国政府在内。

1917年12月3日，苏俄政府又发表了《告俄国和东方全体国民劳动者的宣言》，其中声明：苏维埃共和国废除沙皇政府与东方各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与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瓜分东方各国的条约；苏俄政府从今以后，将在平等、相互尊重和友好的

基础上,与各民族人民建立自己的关系。宣言写道:“等待着你们的奴役,不是来自俄国和它的革命政府,而是来自欧洲帝国主义强盗,是来自那些为了瓜分你们的国家而正在进行战争的人,来自将你们祖国变成他们可以侵略和欺凌的‘殖民地’的人……你们自己应该做你们自己国家的主人……你们有这样的权利,因为你们的命运是牵挂在自己手中的。”就在发表《宣言》的同时,苏俄政府与北京政府代表团于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正式商谈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商谈苏维埃政府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

当时的北京政府,对苏俄主动的友好行动不予理会,致使中苏关系得不到实质性改善。但是,苏俄政府第一批外交文件,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1918年2月间的中国报纸上曾经这样记载着:俄国政府“公布公文声明,凡从前之政府所缔结之一切国际条约,限于1918年1月末以后概行作废”。五月间,《民国日报》撰文说:“俄国新政府所注意者惟在排除资本家之垄断与官吏之强暴而已,至属地问题则亦以放任主义,力反前专制政府之政策,务使人民悉登乐土。对于邻国,则深不满意于日本侵略政策。”文中所述“放任主义”即指民族自由联合、自由分离的民族自决权。在外交政策上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1919年7月底,红军粉碎了高尔察克反革命军队的进攻,并解放了西伯利亚地区。就在这一形势下,苏俄政府于7月26日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其中说:“我们使人民摆脱外国兵力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因为他们压迫被奴役的东方各族人民,其中尤以压迫中国人民为甚。我们不但帮助本国的劳动阶级,而且也帮助中国人民。”明确宣告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宣言“再度敬告中国人民”,苏维埃政府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愿意隶属哪一种国家,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哪种形式的政体,全由

他们自己决定。”

“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

“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店。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

毫不含糊地声明放弃帝俄在中国享受的割地、赔款、治外法权等一切特权，宣言还写道：“如果中国人民愿意象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不成为第二个朝鲜或第二个印度，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向中国人民伸出了兄弟般的友谊之手。宣言最后呼吁：“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我们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自己的代表与我国代表会晤。”

这一宣言由于帝国主义的阻挠，直至1920年3月才在中国各报纸上发表。虽然北京政府对宣言采取冷淡的态度，却受到中国人民的无比欢迎。各界革命人民展开了热烈讨论，各团体纷纷发布致敬电。全国31个社会团体发出诚意感谢的复电。中华劳动人民会的复文写道：“俄国农民、工人、劳农政府、红卫军公鉴：我们中华的人民，接着你们的通知，非常欢喜，知道你们的革命，是要恢复我们劳动者的权利，这为世界人民谋求真正自由平等的幸福。知道你们全俄的农民、工人和红卫军，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中华全体的平民，都佩服你们创造的势力和牺牲的精神。我们劳动界尤其欢欣鼓舞，愿与你全俄的农民、工人、红卫军提携，立在那人道主义的旗帜下面，一齐努力，除去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大同。”

中国人民特别欢迎苏俄关于废除帝俄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北京、上海等地学生以及报界曾集会讨论宣言，他们在复文中说：“吾人以为苏维埃政府之通牒系根据其立国之根本